



关于“中国民俗学会”

——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20 周年

[文章编号]1001-5558(2003)04-0116-05

● 王文宝

[摘要] 本文阐述了“中国民俗学会”艰难、曲折的创建过程，寄希望于新一代民俗学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关键词] 中国；民俗学会；20周年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1983年5月，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的民俗学组织——中国民俗学会在首都北京成立了。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一辈民俗学者和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新一代民俗学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应当珍惜。

1913年，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提出了创立“国民艺术研究会”的倡议。1918年初，刘半农、沈兼士、沈尹默、钱玄同组成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于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起了中国民俗学运动；1920年，成立了周作人负责的由北大歌谣征集处改建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可以说是实现了鲁迅的倡议。1922年，北大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周作人在《发刊词》中把征集歌谣运动称为民俗学事业；常惠在编辑《歌谣周刊》中深感有成立民俗学会之必要，但在开会讨论时被张竞生的“风俗调查会”代替了。1926年，顾颉刚在厦门大学发

西北民族研究

N. W.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3年第4期(总第39期)

2003. No. 4(Total No. 39)



起成立了当地的“风俗调查会”。1927年11月，他在广州才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民俗”命名的学术组织——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其后在闽、浙、粤、川等地也陆续有了同样的地方民俗学组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虽然只冠以“广州中山大学”字样，但它除了发展有本校会员外，还发展有姜子匡、谢云声、翁国梁、钱南扬、叶德均等外地会员，并成立有厦门、福州、漳州分会，具有了地区组织的性质。（二）1932年钟敬文、姜子匡等在杭州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和1943年顾颉刚、姜子匡等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虽然都冠以“中国”字样，但实际都是一种地区性的组织。20世纪40年代李白英和钱小柏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俗学社”，只是上海地区的民俗学组织。1928年3月至1930年6月，周作人、江绍原分别与北大校方和上海的赵景深联系成立民俗学会事未果。（详见江小蕙等《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1930年11月，顾颉刚与史襄哉商谈组织民俗学会事，并拟好了《中国民俗学会发起宣言》（见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90页），也未实现。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曾于1950年初，在上海与赵景深、李白英、钱小柏、蒋维乔等讨论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事，“一致认为解放后应该把民俗学会马上办起来”。（见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编后记》）这是解放后第一位见诸文字记载的创建中国民俗学会的倡导者。

第二位积极倡导者便是杨成志了。他进行了长期不倦的努力。杨老曾对我说，他与潘光旦、吴文藻联名于1956年为国务院起草了《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集体建议》，列出之“搜集整理古文献和汇编民俗丛书的具体规划”有：（一）“古文献目录表”，包括二十四史及其他56种；（二）“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各种资料计划一览表”，包括二十四史、古代类书、各地方志、各民族著作、重要杂志中的民俗资料；（三）“民俗丛书汇编”，包括中国民俗史、民俗学史、民俗志、民俗学概论及各种专题研究数十种。在1961年、196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的座谈会、学术报告会中，杨成志极力呼吁恢复和加强民俗学研究，1962年5月号《民间文学》杂志还发表了他的《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长文。

北京解放初，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1950年创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时与彭燕郊在《光明日报》上编“民间文艺”副刊。

由于当时民俗学被看成封建落后之物，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民俗学陷于停滞状态，只有其中的民间文艺部分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三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扬起了改革开放的征帆，学术界迎来了新的春天。钟敬文联合了顾颉刚、杨成志、杨堃、容肇祖、白寿彝、罗致平，给中国社科院写

信,呼吁恢复民俗学,其内容在《民间文学》1979年12月号上以《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题发表。1979年4月20日中国社科院规划联络局编印的《情况和建设》第96期上刊登了辽宁大学乌丙安、刘航舵1978年12月30日写的《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1979年5月号《民间文学》发表了东北师范大学汪玢玲撰写的《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长篇文章。1980年4月,江苏南通博物馆穆烜在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恢复和发展民俗学之我见》的发言。1980年6月,于彤、陈玮君、莫高在浙江民研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开展浙江民俗学研究工作的三点建议》。

我是在北京大杂院儿里长大的,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又读了一些民俗文化方面的书籍,对祖国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了的中国民研会工作刚恢复不久的1979年夏调到该单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负责整顿全国会员档案和编辑《民间文学工作通讯》。审时度势,我决心做好如下三事:(一)以《民间文学工作通讯》为阵地,大力宣传民俗学,组织壮大民俗学队伍;(二)看望、拜访北京的老民俗学家,联系外地的老民俗学家以及其他民俗学工作者,向他们求教和提供情况;(三)加强学习,蹲图书馆阅读大量有关书籍报刊,抄录相当数量的文字资料(当时尚无复印机)。经过两三年时间,收到了可喜的效果。当时健在的老民俗学家及相关人士如钟敬文、常惠、顾颉刚、杨成志、杨堃、容肇祖、江绍原、常任侠、赵景深、薛山、罗致平、容媛、于飞、闻国新等学者,对他们进行了拜访或与之通信。四次文代会期间,我对常惠和杨成志进行了特别的关照,陪杨老用餐、开会、看病。不少人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一)每到常惠家去,都受到他和夫人常芝英(原名葛孚英)的热情招待,常惠向我介绍了许多他编辑《歌谣周刊》、搜集民俗材料、在北大的学术交往等情况,常芝英把珍藏的她与常惠的结婚照借我复制,常惠送我汉严卯斋《贸易》和齐如山眉批《一岁货声》抄本,他们还在家请我吃涮羊肉。(二)每到容肇祖家,他总是对过去中山大学民俗学活动谈个不停。通过他,我还结识了他的妹妹、女民俗学家容媛。通过他,结识了顾颉刚的女儿顾潮、顾洪,与她们互赠有关书籍、材料。我送她们《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和手头保存的顾颉刚先生填写的中国民研会会员登记表和给贾芝信的两份手迹,她们送我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发起成立的风谣学会同仁的合影照片。(三)我计划为老民俗学家写简介,搜集到许多宝贵材料,但只有江绍原是个空白。我每次到西直门内八道湾鲁迅故居大院内去看望他,问及他过去经历时,他总是避而不谈。他晚年埋头于《易经》的研究,并写有许多笔记。他曾希望我陪他去逛书店,我答应他“召之即到”,但终未实现,甚为遗憾。与其长女江小蕙女士建立经常联系,她赠我不少宝贵材料;近年进行良好合作,为整理和弘扬江绍原在民俗学事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取得了成绩。(四)钟敬文、杨堃、杨成志均是我拜访的老民俗学家的重点,每次见面甚为亲切。当我将自己著作赠送他们时,都受到他们的表扬,他们也将自己的最新著作送我。他们希望我常去他们那里,听我汇报各地最新民俗学活动情况。(五)与北京的段宝林、宋兆麟,辽宁的乌丙安、白希智,吉林的汪玢玲、李文瑞,黑龙江的马名超、王士媛,天津的顾道馨,河北的康迈千,浙江的叶大兵、于彤、莫高,江苏的穆烜、赵志毅、康新民,湖南的巫瑞书、龙海清,广东的谭达先、叶春生、张寿祺,云南的宋恩常,陕西的杨景震,甘肃的柯杨,福建的陈炜



萍，上海的钱小柏、任嘉禾等等活跃于当时的民俗学者进行了经常的联系。为中国民研会编印的《中国民俗学目录选》、《中国民俗学论文史料选编》二书，与《民间文学工作通讯》一起，受到了民俗学者的欢迎。促成了辽宁、吉林、浙江、北京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1982年成了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关键一年，最关键的人物是杨成志、钟敬文、杨堃三老。

杨成志和杨堃多次跟我讲：请你转告钟老，现在该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了，我们推举他当会长。我如实转达二位杨老的意见，以至杨堃叫我陪他乘公共汽车亲自到北师大钟老家去呼吁，钟老均未明确表态。杨成志是1983年创建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最积极分子，他对我说，中国社科院领导梅益是他的同乡，又相熟，向他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会，他会支持的，于是就给梅益打电话商谈“建会”的事，果然得到了梅益同志的积极支持。1982年4月22日，杨成志给我来信：

文宝同志：

今晨打电话给梅益同志畅谈了关于中国民俗学会事宜——他说拟来看我，辞不敢当。下星期二上午他派员来寓面谈一切，然后定时间与钟老、杨老和我等会晤。因电话打不通，请您将七教授组成“中国民俗学会建议书”等下星期二上午带几份来是盼！

专颂

撰绥

杨成志

1982.4.22.

我带着有关材料于4月27日到中央民族学院他家去，向中国社科院科研局高德同志汇报介绍了当时全国正在兴起的民俗学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后杨成志先生又约我去他那里一起给梅益打电话催促。1982年6月5日，钟敬文、杨堃、罗致平应邀到杨成志家与高德同志见面商谈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事，推举钟老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白寿彝为副主任。会后杨成志先生在友谊餐厅宴请了大家，大家并在餐厅门外合影留念。紧接着6月12日，于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内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了筹委会会议，钟敬文、杨成志、杨堃、白寿彝、罗致平、马学良、刘魁立、张紫晨、刘淑娟、王汝澜、梁木森和王文宝参加了会议，正在北京的湘潭大学的鼓燕郊列席了会议。

钟敬文先生1930年在杭州就与娄子匡、江绍原组织了“民俗学会”，1932年与娄子匡等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因此他是最希望早日成立真正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的老民俗学家。1981年以来，辽宁、吉林、浙江、北大等先后成立了民俗学会，形势大好，而钟老在前一段时间对二位杨老的呼吁未明确表态，是有原因的，即秘书长的人选问题。他对我到民研会后几年来在重建民俗学方面的工作是予以肯定的。1981年5月15日，我邀请叶大兵、穆烜、蒋风召开解放后首次民俗学座谈会，受到了他的称许。在1981年8月丹乐会议、1981年12月30日中国民研会常务理事会议、1982年10月浙江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他都接受了我的建议，分别召开了民俗学座谈会。但究竟我到民

俗学界较晚,学识和工作能力不能满足钟老设想中秘书处工作班子的要求,因此当杨成志、杨堃极力推举我时未被采纳。他认为刘魁立是中国社科院的人,又熟悉打报告行文等,这时张紫晨也由外单位调到了北师大中文系。因此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筹委会时机成熟。我负责草拟《中国民俗学会章程》和会员登记表,编印《会刊》,大会期间搞小型民俗展览。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任理事长,马学良、白寿彝、杨成志、杨堃、容肇祖、罗致平任副理事长,刘魁立、张紫晨任正副秘书长。(北师大史学所的刘淑娟虽被任命为副秘书长,但她一直未参与秘书处工作。)

到1988年换届时,有三种设想方案:(一)领导班子年轻化;(二)基本是老班子;(三)老中青相结合的领导班子。经过摸底后发现,老前辈学者都不愿退下来,于是就在原班子基础上增加了刘魁立、乌丙安、张紫晨三位副理事长,张紫晨兼任秘书长。杨成志、容肇祖、张紫晨逝世,1993年第三届中国民俗学会改选时变化就比较大了:钟老继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有马学良、王文宝、乌丙安、刘魁立、杨堃、宋兆麟、张振犁、柯杨、段宝林、陶立璠,秘书长刘铁梁。领导班子中新人占了多数。1998年第四届除了马学良、杨堃逝世外,原三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不变,而副理事长增补了叶春生、齐涛、刘铁梁、李惠芳、陈勤建、周星6人,周星兼任秘书长,可算是老中青相结合的格局吧。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在钟老去世以后为了平稳过渡,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不变,只增加了贺学君1名副理事长,高丙中任秘书长。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年来,在广大民俗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对钟敬文、顾颉刚、周作人、江绍原、杨成志、杨堃、容肇祖、白寿彝、马学良、钱小柏、张紫晨等等,特别是杨成志、钟敬文、杨堃为中国民俗学事业及民俗学会的建立做出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希望我们继承先辈们的敬业精神,努力工作,开拓创新,为学会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效率化、透明化、民主化,为在21世纪把中国民俗学事业推向更加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03-07-15

[译者简介] 王文宝(1929~),男,民俗学史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100001

On China Folklore Society: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hina Folklore Society

Wang Wen-B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lates to the arduous process of the founding of China Folklore Society hoping that the folklore scholars of new generation carry on the past and open a way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a; folklore society; the 20th anniversary